



台灣生命力的張本：孝

● 林柏維*

1. 百善孝為先

宋代以後，中國經濟的主體已移向南方，伴隨北方中國政治力的擴展，繁榮的江南經濟圈逐步沿著海岸向東南區域蔓延，溫州港開啟海外商業的道路，隨後，泉州港的海外貿易盛極一世，拓展出海上絲路，福建商人建構出華人的海洋世界，也造就出海外移民的浪潮，台灣自屬「閩商」海外世界移墾的一環。

寬闊的視野與心胸成為「閩商族群」的特質，然而，貨殖為本的移民世界，依舊屬於華人社會生態，儒家社會的倫理規範雖然仍是生活的準則，卻也因地制宜而有了「輕重」之別；離鄉背井既是必然，「安土重遷，黎民之性。」、「父母在，不遠遊。遊必有方。」、「舍祖宗之丘墓、族黨之團圓，隔重洋而渡險，竄處於天盡海飛之地哉！」¹的教條不可守，儒家文化遂有著「淺碟化」的樣態，或被釋義為儒家邊陲社會。

在半世紀前，西方社會對近代日本的崛起關注頗力，探究日本社會力的原本，或以為「武士道」為其文化的驅動力。韋柏在《基督新教倫理》中探討文化驅力，認為新教倫理是西方資本主義發達的原動力，那麼，日本呢？是儒家文化；做為儒家文化圈的一員，日本的文化驅力是儒家的「忠」，台灣呢？是「孝」，「孝」是華人社會追求成就的文化價值驅力。

* 林柏維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理教授。

¹ 《諸羅縣志》卷六、賦役志，頁 87。



2. 泛道德的儒家倫理

泛宗教化的儒家，道德就是法律規範。「台灣移民大都來自閩粵地區，而且多半屬於經濟性移民。其渡海來台或遷台後再移向邊陲區的動機，主要係在謀求經濟利益或希圖改善其生活狀況」²在台灣移墾社會形成後，官僚體系建立，形構出傳統的中國儒家社會，顯現出中央威權僅及於官僚行政系統，地方控制的基礎乃建立於家族與下層士紳階層的儒家式忠誠之上。³

家族領導者與下層士紳階層的主宰力量，來自於儒家規範所賦予的威權，誠如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所說的「卡里斯瑪」(Charisma)支配，具有卡里斯瑪特質的人，被認為是超凡的、超自然的、超人的，具有特殊的品質，他們常被稱為「領袖」；「卡里斯瑪支配」則指被支配者產生對領袖的完全效忠和獻身的感情依歸。而「孝」則是儒家文化裏的「卡里斯瑪支配」的具體表徵，所謂「百善孝為先」是也。

余英時的「新儒家倫理」是從上層文化結構中尋找文化價值裡的標籤，無法用來注解下層的社會活動，尤其是邊陲的、淡化的、去核心的華人移民社會。孔孟先哲可以是心靈的文化神符，過高的道德規範在華人的海洋世界裏，很難成為俗世的醒世格言；在這裏，功名被俗世化為顯親的標籤，俗民生活裡，科舉考試成為邊陲社會菁英改換身分的「商業法則」，這一法則肇因於儒家文化內裏的重農輕商之價值觀，此種限制使傳統仕紳不能參與商業、工業技藝的事業。反之，邊陲社會的下層仕紳，汲汲於經商致富，他們：「最重要責任就是在如何提升，或者維護整個家族的名聲、社會地位、以及財產。能夠做到這項要求，就被認為是孝子賢孫。」⁴是以富而則學、學優則仕，仕商並轡而不悖。

3. 成就取向：出狀元

移民的、邊陲的海外華人社會，文風不盛致科舉功名取得不易，於是，儒家規範

² 蔡淵黎〈清代台灣的移墾社會〉，頁47-48。

³ 參見 M.Weber《中國的宗教》，新橋譯叢，頁132、151、200。

⁴ 宋光宇〈重利與顯親〉，頁49。





有著彈性化的、自取所需的註解，揚名顯親的孝道表現外塑為兩條路徑：一舉成名與經商致富成為成就取向的兩元選擇。

台灣的移民具有濃厚的經濟取向特質：高度的市場取向、富於創業精神、社會特重財富。在移民社會中經營商壘事業、參與科舉或取得軍功，從而進入社會上層，無疑的是眾多移民奮鬥的方向。

由於，國家官僚的出身管道來自科舉制度，意即儒家與任官的考試制度結合，而儒家文化裡，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。」的社會階層意識也因之而盤根錯節，突顯出：儒家社會的菁英們以追逐功名為終生標的的普遍現象。作為邊陲社會的台灣，雖然行政體系之束縛力呈現弱化狀態，但仍在儒家倫理的框架裡，因此，領導壘拓的有力之士，在經由商業貿易與墾植事業後，上升為社會縉紳，進而拓展家族勢力，成為地方望族。⁵其家族成員倘能成為官員，對財富與土地取得的累積及家族勢力的擴張有著決定性的影響；因此，科舉功名的成就取向仍是仕紳家族的首項選擇。

4. 揚名顯親：賺大錢

在八股科舉取士，舉人、進士份額有限以及他省冒籍頂替的情勢下，揚名顯親的孝道表現的另一路徑：經商致富，對商業性格強烈的閩粵移民而言反是最易達成。

致富與功名在台灣諺語中也表露無遺，諸如：「挽面挽高高，生子中狀元。頭額挽予懸，生困中狀元。喙口挽予金，錢銀滿厝間。」、「高椅坐高高，生子中狀元，腳踏低低，賺錢賺真儕(多)」、「世間事業百百款，良心做事免操煩，萬事與人會圓滿，子孫代代出狀元。」、「今要轎門雙片開，金銀財寶歸大堆；新娘子婿入房內，生子生孫晉秀才。」、「一錢分，年年春(剩餘)，狀元子，舉人孫。錢樹搖高高，生子生孫中狀元。」；再如喪儀過程中封釘儀式裡，道士唸唸有詞的：「一點東方子孫代代出狀元，二點南方子孫代代大賺錢……」中狀元、賺大錢在俗民文化裡是最常見的語彙，表露著普羅民眾的人生自我期許。

《漢書》〈食貨志〉所謂：「棄本逐末，耕者不能半，奸邪不可禁，原起于錢。」

⁵ 參見蔡淵毅〈清代台灣的移民社會〉，頁47-59。

洋溢著重農輕商的思維。明代學者胡應麟《詩藪》有謂：「今題金山而必曰金玉之金，詠赤城而必雲赤白之赤，皆逐末忘本之過也。」更顯露士大夫階層的「賤」商思想。抑商思維在文風不盛的移墾社會僅止於上層仕紳群體，殖產興利反是大行其道，乃至與科舉功名並駕齊驅。

5. 台灣生命力的源泉

台灣的中小企業數佔整個企業數的 98% 以上，很清楚：造成台灣經貿出口成長的主角是中小企業。一般以為中小企業發達的原因有：人人想創業、規模小易於籌措資金、技術層次低易於管理、能充分發揮自利效益、約束少易自由發展。⁶是這樣表面化的答案嗎？顯然不是，前述，揚名顯親下外塑出的兩條孝道表現路徑：一舉成名與經商致富才是社會驅力的根源，兩元的成就取向選擇，更偏向於經商致富。

經商致富非一蹴可即，須仰賴於不斷的「打拼」，「打拼」的終極結果則是揚名顯親於社會大眾，這樣的心情在台灣歌謠中俯拾皆是，如〈媽媽請你也保重〉所唱：「我也來到他鄉的這個省都，不過我真打拼的，媽媽請你也保重。」為父母而打拼，並自我期許：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愛拼才會贏。」

在台灣民間「打拼」的義涵實即「勤勞」，所以，學者陳介玄探究國人喜歡當老板的原因，歸結出來的是「文化資源方面所能夠得到的回饋」⁷，而這一回饋的文化底層，就是被肯定為：「我是勤勞的」的需求；台灣的中小企業如是「擬似西方資本主義」，那麼，類似韋柏所提「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驅力是新教倫理」，「勤動主義」就是台灣的「新教倫理」。

⁶ 于宗先〈中小企業〉，《台灣經驗四十年》，頁 346-348。

⁷ 陳介玄《協力網絡與生活結構》，頁 308。

